



应用语言学译丛

语言规划

——从实践到理论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著
理查德·巴尔道夫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考察并评论了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本书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定义、目前的做法、目标以及思维方式等问题，作为了解本学科当下实践的基础，然后从两个角度描述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的核心元素。在第二部分，概述了语言规划数据收集方法，并讨论了教育语言规划、识字和语言规划中的经济学等关键的跨社会问题。在第三部分，包含了语言规划中与语言和权力、双语和地位以及特定目的问题有关的个案研究。最后两章汇集了从目前实践中产生的在构建该学科理论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关键问题与困难。书后附有一个各政体语言规划情况的参考附录。

本书提供了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唯一的最新的综述与评论，并激励语言规划者更加批判地思考这个学科。由于语言将被规划，那就需要考虑如何来实施。

<http://www.cp.com.cn>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ISBN 978-7-100-17241-7



9 787100 172417 >

定价：88.00 元



应用语言学译丛

语言规划

——从实践到理论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著
理查德·巴尔道夫

郭龙生 译

刘海涛 审订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美)罗伯特·卡普兰,
(美)理查德·巴尔道夫著;郭龙生译.—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9

(应用语言学译丛)

ISBN 978-7-100-17241-7

I. ①语… II. ①罗… ②理… ③郭… III. ①语
言规划—研究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852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语言规划

——从实践到理论

〔美〕 罗伯特·卡普兰 著
理查德·巴尔道夫
郭龙生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241-7

2019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1 1/4

定价:88.00元

导读：语言规划的生态观

刘海涛

一般认为，术语“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是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于1959年在一篇题为《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至今为止，也有近60年的历史了。

我们曾经从数十年的语言规划文献中提取了30多种定义，通过分析，认为语言规划领域具有这样一些特征：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发展的干预，是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一种活动；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语言问题的，所谓语言问题是由语言的多样性引起的交流问题；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语言规划不仅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语言规划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规划与语言学其他领域的不同在于，它通过明显的、有组织的人工干预在自然语言中引入“人造”成分。这基本上是1980年代中后期之前人们对于语言规划的一些看法。199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规划又有了更多的认识：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语言规划不是要消灭语言的多样性，而是要保护这种多样性；语言规划的目的不再只是解决交际问题了，而是也应该考虑其他非

交际的问题，也应该考虑受众的感受，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影响；语言规划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和社会学、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应该被视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语言规划作为一种研究领域出现后的近 60 年间，学科本身的目标和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语言规划的研究者而言，这种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正如埃金顿（Egginton 2005）所说的那样，为了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语言问题，语言规划的作用正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如何在继承语言规划研究者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更适宜的语言规划架构，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单从数量上说，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这些成果大多散落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各种语言学和其他专业出版物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学科的多元性及其生命力，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学科的整合，不利于初学者进入学科，不利于学科的继承和发展。鲁伊兹（Ruiz）早在 1984 年就提出过语言规划应将现有成果整合为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架构，但进展甚微。这种状况在您手里拿的这本著作出现之后，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尽管此前也有一些语言规划的专著问世，但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均难以与我们现在介绍的这本著作抗衡。这就是由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理查德·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合著的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原书由英国的 Multilingual Matters 出版社于 1997 年出版。目前，这本书在谷歌学术的被引已近 1200 次，是语言规划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罗伯特·卡普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应用语言学荣休教授。曾任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应用语言学年刊》）主编（1980—1991 年）和编辑部成员（1991—2000 年）。他主编了享誉学界的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牛津应用语言学手册》[第二版]），是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语言学国际百科全书》，首版和第二版）和多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他已著、编了 50 余本著作，在各类学术刊物和文集中发表了近 170 篇文章和上百篇书评，为美国政府等机构编写过 10 部专门

报告，出席过 200 多场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学术会议，并做了演讲。

在应用语言学界，卡普兰的名字是与“比较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学术研究不仅限于这一领域，他在大洋洲、东亚、中东等地的十多个国家进行过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罗伯特·卡普兰教授获得过许多学术奖项，担任过多个学术组织的主席。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理查德·巴尔道夫 1943 年生于美国哈特福德，在迪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获历史与政治学学士学位（1965 年），并先后在夏威夷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1970 年）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1975 年）。巴尔道夫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逝世，生前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育学院荣休教授，同时也担任多种学术刊物的编辑与主编，是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pplied Linguistics（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的副主席，也曾担任过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协会会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TESOL 以及科学计量学。据不完全统计，巴尔道夫教授一生编著过 22 本书，撰写过 100 多篇学术论文。他培养过 20 多位博士和 40 多位硕士，由于在指导研究生方面的突出表现，2007 年巴尔道夫荣获昆士兰大学的“杰出导师奖”（Research Higher Degree Supervision Excellence Award）。他的博士生中，已有许多人成为国际知名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学者，如赵守辉、克里·泰勒·利奇（Kerry Taylor-Leech）、奥贝德·哈米德（Obaid Hamid）、凯瑟琳·休肯赤（Catherine Siew Kheng Chua）、华提梅源（Hoa Thi Mai Nguyen）等。巴尔道夫去世后，昆士兰大学教育学院设立了“迪克·巴尔道夫奖”（Dick Baldauf Memorial Prize），用来奖励那些在巴尔道夫教授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优秀学术发表的（硕）博士生。

卡普兰（2016 年）深情回忆了他与巴尔道夫的友谊与合作。除了现在的这本《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外，他们联合编著的著作还有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Kluwer, 2003），以及数十本语言规划国别研究著作。除此之外，他们还于 2000 年共同创办并主编了刊物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以上刊物和专

著均由 *Multilingual Matters* (后为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这些著作所涉及国家和地区达数十个,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这些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案例中,作者都采用了一种基于语言生态的理论架构,这种架构首先由卡普兰和巴尔道夫于1997年在本书中提出,后又在他们2003年的合著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采用一种理论架构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的研究,此前不能说没有,但涉及国家和地区如此之多,分析如此深入,却是没有先例的。这一方面说明该理论架构的普适性,另一方面也证明本书用“从实践到理论”作为自己的副标题是有道理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副标题从“实践”到“理论”的先后顺序,也恰好反映了二位作者从自己所熟悉的、务实的应用语言学切入这一领域,然后构拟出符合实践活动理论模型的历程。下面我们转到这本著作内容的介绍。

正如本书开篇所言,语言规划的历史可能如有史记载的人类历史一般古老。如果我们考虑到记载人类历史的语言文字,无一不是人类有意识的产物,作者并未言过其实。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最具变化的时代,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什么都在变的世界里,人类除了努力使自己适应变化之外,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尽量规范和控制这些变化。“语言规划”便是人类有意识影响语言发展的一种努力。

语言规划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虽然我们不乏这一方面的专著和文集,并且也已有一些主要针对这一领域的专门学术刊物,但仍然缺乏一种建立于各家之言之上的、具有普适意义的语言规划理论。本书的立意就是成为一本这样的著作。英文原书分为四大部分,计11章,403页。

第一部分题为“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共有三章),这一部分可看作是关于语言规划的入门读物,其中包括术语、几个便于理解语言规划过程的架构以及几种常见的语言规划的目标等内容。在“规划的环境与术语基础”一章里,作者从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其他组织和个人等角度考察了语言规划现象,这有利于读者从更大的范围理解这种活动。我们认为这种全方位的背景考察,较之过去常见的“语言规划”只是一种

“政府”行为，更客观地反映了语言规划的事实。鉴于此，作者给出了语言规划的简要定义：“语言规划是某些人出于某些原因修改某些社团语言行为的活动。”视其规模，语言规划可分为宏观和微观规划，二者在复杂程度和主要角色方面均有差异。语言规划的主要对象是语言，然而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各种学科对于语言的分类也有较大的差异。为了便于随后的讨论，作者详细考察了语言在“官方”“社会”“教育”“通俗”方面的定义。

第二章的主标题为“规划的架构”，副标题为“谁为谁做什么”。据此，不难看出，一个语言规划的过程应含有这三要素：规划的制定者，规划的目的，规划的接受者。本章主要介绍了豪根（Haugen）、库珀（Cooper）和哈尔曼（Haarmann）等人的三个互为补充的语言规划理论架构。

在语言规划界，研究者们习惯于把这种活动分为两类，其一主要是对语言本身进行的修改，其二是对语言使用环境的改变。前者为“本体规划”，后者被称之为“地位规划”。本书作者认为如此分类过于简单，因为在具体实践中，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时它们之间也是关联的、互动的。对此，费什曼（Fishman）早在80年代初就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缺乏本体规划的地位规划，就像走进了死胡同；相反，缺乏地位规划的本体规划则类似于文字游戏，是一种没有社会功效的技术实践。”事实上，“任何对语言本身的改变极有可能引起使用环境的变化，使用环境的变化也有可能引起语言特征的改变”。在实施的主体方面，“地位规划一般由官僚机构和政治家来实现，但本体规划只有通过语言学家来完成”。

在此基础上，豪根提出了一种由社会（地位规划）、语言（本体规划）和形式（政策规划）、功能（语言培养）的语言规划模型。这四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以下四类语言规划的主要过程：决策过程、教育传播、规范化过程和功能拓展。这样的细分对于深入理解语言规划活动当然是有益的。但也应该清楚，并不是所有的语言规划过程都包含豪根模型中的地位规划，也不是所有的语言规划活动都含有这四种过程。

接下来，作者结合实例讨论了地位规划中的语言选择问题。在一个具有多种语言的国家，这样的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国家必须有一种语言来

和自己的公民进行交流”。语言选择又可分为两个阶段：问题的确立和标准的确定。在这二者之间，前者更为困难。这是因为语言选择不可在真空中进行，而应建立在语言学信息的基础之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信息又不存在。除此之外，民主、平等也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母语为国家共同语的人其语言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具有中立性的语言有时会在选择中更有优势。所谓标准的确定，指的是一旦选定了某种语言，接下来所进行的语言变体的选择，如在香港有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美国英语、印度英语和香港华人英语，哪一种英语更适宜作为香港的官方语言呢？当然，如果选定的是一种有待于“规范”的方言，那么也需要做相应的规范化。语言选定后，属于地位规划的工作还有“实施”，这一过程又包含两个步骤：一是如何来社会化所制订的规划，二是如何来监控和评估计划的实施。

作者也以豪根的模式为基础，结合其他学者对于本体规划的讨论，对本体规划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本质上，本体规划是针对语言内部的改变。具体来说，文字改革、拼写改革、词汇的扩展、发音的规范、术语现代化、文体的丰富和语言的国际化等，均属于本体规范的范畴。豪根将这些活动分为两类：规范的建立和语言功能的扩展。

每一种语言规划都与其实施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可以按照环境的不同将规划分为各种层级。哈尔曼在豪根模型中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基础之上，增加了第三种维度——“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地位和本体规划是一种能产性的活动，而声望规划却是一种接受性（或价值）功能，它会影响地位和本体规划是如何被规划者执行的，又是如何被受众接受的。哈尔曼的理论架构有助于我们对于语言规划层级的理解。政府、机构、团体和个人虽然都可能进行语言规划活动，但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声望，因此自然会影响到规划的执行效果。

语言规划活动的规模无论大小，都有可能是有声望或没有声望的，都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因此，也许我们可以不从活动的规模及其影响着手来研究规划的层级性。语言规划的传统一般认为规划是一种大规模的

活动，即它主要出现在宏观层面。但实际上，语言规划发生在各个层级，尽管在本书成书时鲜有文献研究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问题，但它们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意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样一来语言规划作为一种学科的重要性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

本章也介绍了库珀提出的一种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为了构建这个架构，库珀认为“语言规划，依次是（1）创新的管理；（2）市场化的实例；（3）获得和维护权力的工具；（4）决策的实例”。在此基础上，他考虑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定者（actors）？针对什么行为（behaviors）？针对哪些人（people）？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ends）？在什么条件下（conditions）？用什么方式（means）？通过什么决策过程（decision making process）？效果如何（effect）？显然这八要素是针对语言规划行为本身的一种分析。应该承认，库珀提出的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是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这也是本书作者对其进行详论的理由。具体说来，规划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既包括精英人士，也包括算不上精英的执行者；就规划欲影响的行为来说，有这样三部分内容：所规划行为的结构（语言学）特点，行为的目的和用途，采用的层次；在规划的对象方面，需要考虑对象的类型，对象学习所规划行为的时机，对象学习/使用所规划行为的动机，对象排斥所规划行为的动机等；在设定规划行为的目标时，不仅要考虑到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行为，也应顾及一些非语言的行为等；环境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除了要考虑规划的特殊环境外，也应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系统的影响、可用信息等因素；手段方面，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用最适宜的方法；决策过程也应吸取一般科学决策的方法和程序。由此看来，库珀所提出的语言规划分析模式看似简单，但真要用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作者又对库珀的语言规划八要素进行了详解。

本章的重点之一是豪根的语言规划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规划的范围和过程。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是库珀所提出的语言规划的八要素，尽管学者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不能仅考虑这

些关系，而且也应该从语言规划的受众角度来分析语言规划问题，但库珀的模式仍然是语言规划领域中最常用和最有用的分析模式之一。

在“语言规划目标”一章里，作者将语言规划的目标分为“语言净化”“语言复活”“语言改革”“语言标准化”“语言传播”“词汇现代化”“术语的统一”“风格的简化”“语际交流”“语言保持”等领域，并且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作者认为语言规划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的实行远比“从上到下”的命令方式要复杂得多。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语言规划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关键性问题（共有三章）。第四章对语言数据的收集、规划方案的制定、实施等均有详细完整的讨论。就方法论而言，虽然作者认为制定规划的基础是社会语言学调查，但历史分析、教育评估、人类语言学、大规模语料库的使用和民族学研究等方法也在规划的过程中有一定的作用。按照本章所提供的方法，读者甚至可以开始自己的语言规划工作。一般而言，制定了规划方案之后，均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第五章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教育方面的语言规划因为要涉及具体的个人，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规划。从微观、宏观的角度看，一般的语言规划大多由政府一级的组织来进行，涉及社会的许多领域，因此是一种宏观的规划，而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与其相比范围要小得多，因此是一种微观的规划。作者也给出了一种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实施、评估的流程图，由此流程可以看到，教育领域语言规划不仅应该考虑和遵循一般语言规划的流程，如：预规划—调查—报告—政策制定—实行—评估，也应该考虑这一过程和教育政策的关系。对于读者而言，作者在本章介绍的这一规划过程非常有意义，因为微观语言政策的制定许多人是有机会参与其中的。如同人类的任何计划和政策一样，语言规划的实施也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持。第六章讨论了语言规划过程中的经济问题。考虑到没有经济基础的计划，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经济效益的计划，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这一章所论述的内容对于语言规划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章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为例，讨论了语言规划和经济的关系。数据显示，语言规划不仅和采用规划的政体内部的经济有关，也有

助于增强其与外部的商贸关系。从宏观语言规划的角度看，由于涉及的因素太多，规划和经济的关系难以理得清清楚楚，但许多微观语言规划的例子说明语言规划确实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好处。

第三部分是案例研究，分三章，共讨论了 15 个语言规划的例子。在讨论过程中，作者有意使用了第二章提及的三种语言规划架构，这样做不但有益于进一步加深对如前所述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而且也有益于新的理论架构的发展。第七章讨论了语言规划和权力的关系问题，重点为阶级、国家和机构在语言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这一章的讨论分析表明在规划的过程中，威望是至关重要的。按照豪根提出的语言规划架构来看，第七章主要涉及的是语言的地位规划。用库珀模型来看，这一章讨论的重点是语言规划过程中的 WHO 和 HOW。第八章研究了双语制、语言地位和国家认同与发展的问題，强调了语言是为谁（FOR WHOM）、为了什么目标规划的。这一章也属于地位规划的范畴。第九章的主题是特殊用途的语言规划，如科技领域的语言规划、学术机构在术语和词汇发展中的作用、与翻译相关的公司语言问题、大学内部语言政策等。从库珀的语言规划架构来看，这一章要解决的问题是教什么和学什么（WHAT）的问题。在豪根的系统里，这属于本体规划的范围。

前面这三部分的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前人有关语言规划理论研究和具体的语言规划实践基础之上的，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本书副标题中的“实践”。通过这些章节，读者对语言规划的一般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书中大量的语言规划实例也非常益于读者理解构成这一过程的三个主要因素：WHO，WHOM 和 WHAT ENDS。

按照本书副标题的指引，下一步该由实践到理论了。换言之，接下来的第四部分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在这一部分里，作者提出了一种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这一模型较之过去的许多理论和方法而言，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因为语言规划不是一种孤立的活動，对于一种语言采取的规划行为不只涉及这种语言本身，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语言。作者提出了语言规划（或语言生态系统）的如下变量：语言消亡、语言生存、语言变化、语言

复活、语言变化和语言传播、语言融合、语言接触与皮钦语 / 克里奥尔语的发展、语言能力的发展等。这些变量是描述语言状况时应该考虑的关键因素，是研究语言生态的主要着力点。正是由于这些变量的变化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语言的状况和发展，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和实施者们更应该对这些因素进行详尽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由于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带来的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些变量如何在语言规划过程中起作用，作者用一定的篇幅细说了这些变量。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基于生态理念的语言规划模型，并且认为语言规划的实施者应该清楚地分析、理解所欲进行规划的语言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做好规划工作。作者用生态理论分析了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瑞典、美国的语言生态系统。这对于其他国家语言生态系统的描述，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们此前说过，在本书问世后，同一家出版社已出版了多本涉及数十个国家的著作。这套丛书所遵循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模型，就是本书所建立的生态模型。该模型的最新描述，可参见这两位作者 2003 年所著《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一书的第十二章以及他们为本书中译本专门撰写的补记。由此可见，这一综合性的语言规划理论是有较强的描写能力的，极有可能发展成一种具有鲁棒能力的语言规划理论。

在题为“政体背景下的语言规划”的附录中，作者列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特别有用的是相关国家的语言规划参考资料，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指引作用。近 50 页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更是读者深入这一领域的指路明灯。

埃金顿总结了本书对语言规划领域的几点贡献 (Eggington 2005)：

- (1) 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不是独立的活动，二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 (2) 语言政策不仅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的政策，微观的语言规划活动更为常见，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 (3) 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说法是不现实的；
- (4) 任何语言规划活动都是在一些密切相连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
- (5) 语言规划是一种需要学术和语言社团共同参与的复杂活动，这里

所说的语言社团包括规划活动涉及的所有语言的全部使用者；

(6) 语言规划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这种活动不应该只从教育部门开始。任何语言规划活动均应包含活动所在生态系统的整体；

(7) 语言规划应该以民众为中心。换言之，理想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的实施宜采用自下而上的策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8) 成功的语言规划是一个实施—评估—修订—实施的循环连续过程。

总的说来，本书综合了各家之言，提出了一种基于生态概念的语言规划理论。较之以前的理论而言，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解释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本质上本书强调的仍然是语言规划的社会（语言）学特征。对于本体规划方面的问题，其讨论仍然是过于简单。例如，作者在论述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时，引述了陶里（Tauli 1984）一文的观点。但事实上，陶里的文章所倡导的是要重视从语言评价到本体规划的语言规划理论，并且对于常见的那些只注重社会方面的规划理论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说：“然而，目的论要重于社会学……语言规划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使得语言成为一种更有效的工具。……我们应该使语言更适宜于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Tauli 1984）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它也是文化的容器和身份的象征。语言的这三种功能要求不同的政策来保证，这就使得语言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语言政策时，不得不均衡考虑各个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政策的重点也会有不同。对于一个新成（独）立的国家，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象征功能就要强于文化功能，而在一定时间之后，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内部各民族的均衡发展就显出其重要性了。我们可以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中的这种转变视为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语言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各个时期重点的不同也要求不同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来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本书提出的语言规划的生态模型更多的还是一种修辞性的说法，还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生态模型，但本书所强调的用多因素来分析语言（规划）问题，还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由于巴尔道夫教授的过早离世，我们不再能看到本书第二版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巴尔道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Baldauf 2012）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学科的回顾与对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展望。

如同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本书不仅对于语言学、语言、教育等领域的读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对政府、教育机构的相关人员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尽管本书问世已有20年了，但正如泰勒·利奇（Taylor-Leech 2016）所言，由于其对语言规划领域的奠基性贡献，无论是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新人还是资深学者，本书均应成为他们必备的案头书。

20年前，为了向中国大陆的学者介绍这本书，我通过邮件结识了当时在悉尼大学任职的巴尔道夫教授。期间，我与他通过许多邮件，也与他的博士生赵守辉、李明琳成为了好友。20年后的今天，作为《应用语言学译丛》的主编，我很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向各位推荐这本书的中译本。感谢郭龙生教授，感谢商务印书馆，使我们可以不再等待。

参考文献

- Baldauf, R. B., Jr. (2012). Introduction – Language Planning: Where have we been? Where might we be going? *Revista Brasileira de Linguística Aplicada*, 12(2), 233–248.
- Egginton, W. G. (2005). Introduction of Part 5. In P. Bruthiaux *et al.* (Eds.), *Direc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B. Kaplan* (pp. 223–226).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Kaplan, R. B. (2016). Dick Baldauf: memories of a friendship and collaboration.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7(1), 131–139.
-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Jr. (2003). *Language and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the Pacific Basin*. Dordrecht: Kluwer.
- Tauli, V. (1984). The failure of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In Gonzalez, Andrew (ed.), *Panagani: Essays in Honor of Bonifacio P. Sibayan on His Sixty-seventh Birthday* (pp. 85–92). Manila: Linguist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 Taylor-Leech, K. (2016).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the contributions of Richard B. Baldauf Jr. to the field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7(1), 1–10.

中译本序^①

随着中国对语言政策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本书可能会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兴趣并对他们有些用处。撰写本书，纯属作者 1983 年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举办的“华语社区语文现代化与语言规划会议”上相遇时偶然产生的一个想法，我们参加了该会议的分会“现代化与语言发展研究规划专题研讨会”，该会议也为中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提供了第一次共聚一堂共商语言与语言规划问题的机会。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撰写一本专著，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既从当时理论问题的角度，也从世界各地特定政体中应用的角度 [后者可参见本书的附录]），通过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不同文献汇集起来而将该领域的学科状态呈现出来。本书中的材料还为我们由八个部分组成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模型（见书后所附补记）提供了基础，并通过太平洋地区的政体来说明其特性。通过我们在本书中的工作，这一框架试图总结“经典”语言规划观点中的智慧，并成为当前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针对这一框架，我们做了持续的努力，考虑并讨论了规划过程与目标的层级（宏观、中观和微观）、目标意识（显性和隐性）和语言规划参与者或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在此介绍中随后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此

① 本书的全部脚注除注明外均由译者所加，书中不另外注出，特此说明。